



# 承認錯誤 澄清誤解

單國璽樞機主教

(編者按：台灣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與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及十一日，在輔仁大學舉行了「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為單國璽樞機主教在開幕禮發言的主題講話。)

**陳主教、湯主教、黎校長、各位學者專家、各位貴賓：**

研究天主教在華傳教史的學者都知道：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光榮，也有恥辱；有興盛時的喜悅，也有教難時的血淚。元朝時孟高維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曾被教

宗任命爲大都（北京）總主教及遠東宗主教，在大都建堂並成立修道院，且派人南下到泉州等地開教。教務一時頗爲興隆，但只是曇花一現，隨著元朝的滅亡，也就在華消聲匿跡。

聖方濟沙威懷抱滿腔熱誠，仰慕中華文化，但不得其門而入，最後目視中國大陸，壯志未酬身先死，在上川島上病逝。利瑪竇進入中國時，小心謹慎，細察民情習俗，盡量適應中國文化，廣交文人士大夫，引進西洋科技，天主教一時頗受士大夫敬仰推崇。但不久之後發生了「禮儀之爭」，從此天主教在華便無寧日，教難迭起。

鴉片戰爭及五口通商之後，因了不平等條約的簽立，西方列強的勢力不斷地侵入中國，因而引起一般民衆的排外仇教心理。教會的處境可以說是雪上加霜，教案迭起。西方列強便利用教案，要求清廷割地賠款，並以保教姿態呈現在國人面前，給一般人的印象是天主教和帝國主義似是分不開的。這是義和團仇教的重要理由之一。

今天有許多學者專家從各方面研究義和團事件的前因後果，我只簡略地講述下列幾點：一、保教權的後遺症，二、歷史懸案的大誤解，三、教會內的先知先覺者，四、教會的反省與道歉，五、客觀研究義和團事件的重要性。

### （一）保教權的後遺症

在我國一般人的印象中，所謂的帝國主義和教會在中國的發展是脫不了關係的。鴉片戰爭及五口通商之後，有些傳教士們搭乘西歐列強的船隻來到中國。西歐列強和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有些外國傳教士憑藉這些條約，以及這些條約背後的兵船、大砲，推行傳教工作。一般中國人大都認爲，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民教衝突頻頻發生的原因。有些傳教士用強勢的方式傳教，扮演了壓迫者的角色，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幫兇，而中國百姓則在愛國的情緒中，反抗這些壓迫的行爲。義和團運動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行動，雖然內裡包

含一些迷信的成份，例如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等等，但其根本的目的是消滅外國傳教士和他所傳的宗教，他們的口號是「扶清滅洋」。

傳教士來到中國的目的，當然就是爲了傳播福音。「傳播福音」作爲傳教士的主要職志，無論在十七世紀、十九世紀或是現在，都沒有差別。我們現在推動的福傳工作，在本質上，與任何時代或任何地區的福傳工作也都沒有任何差異。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一些傳教士的問題是：那是一個民族主義思想高漲的時代，來自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時的傳教士，不可能不受時代潮流的影響，難免於以其本國文化爲榮。相對於當時中國物質文明較落後的情況，他們中有些人很自然而然地表現出優越感，想要將其信仰以外的文化加諸於其傳教區中。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教友，和我們現在的教友一樣，有相同的信仰。根據我的實際經驗與觀察，過去的教友大多數在道德生活方面更好些，

因爲過去的社會更純樸，教會的要求也更嚴格，而現在俗化的社會風氣是比過去墮落的。只是在他們中，難免有些對信仰認識不夠，看到一些傳教士和外國勢力的關係，看到教友們受到傳教士的保護，看到教堂掛上了法國國旗或意大利國旗，於是想要藉著成爲教友，依靠傳教士的關說，在地方利益的爭奪或是法庭訴訟時得到好處。

## （二）歷史懸案的大誤解

義和團事件稱爲天主教在中國史上最大的民教衝突事件。教會的認知和西方世俗學者，以及在中國受唯物史觀影響下的歷史研究者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這個事件至今尚未定論，還是一件歷史的懸案。解決之道無他，教會歷史的研究者，應該增加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相關的傳教修會團體也有責任整理相關資料，提供作爲義和團研究的基礎。其中在河北有遣使會及耶穌會，山東有聖言會及方濟各會，河南有米蘭外方傳教會，東北有巴

黎外方傳教會，山西有方濟各會，陝西有方濟各會及米蘭外方傳教會，內蒙有聖母聖心會。這些修會的基本資料是以往的西方研究者及中國研究者極少利用的，我相信這也是他們對天主教存在不少誤解的重要原因。

我想「誤解」這兩個字是對義和團研究中，天主教角色的最好說明。這種誤解的第一個原因是擴大解釋，以偏概全。少數傳教士的不當行爲，要由全體傳教士共同背負；少數教友的惡劣行爲，牽連所及，全體教友都成了犯罪集團。因爲長期的社會對立、治安惡化，教友結寨自保的舉動，被說成了國中有國，目無法紀。連善良而爲信仰殉道的農民婦孺聖人聖女都被說成地痞惡霸及賣國賊。

第二個原因是倒果爲因，本末倒置。原本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就有嚴重對立的情況，傳教士及教友們只是成爲各種對立面的其中一方，並非基本上構成對立的來源。傳教士及教友們在敵視的環境中屢屢受到迫害，爲此，大部份傳教士們在此情況下，

才尋求外國政府的保護，並請其政府和中國政府進行交涉。姑且不論這樣做是否傷害到中國人的情感，但對天主教的迫害，才是這類不愉快交涉的原因，並非在華的傳教士有意運用這類交涉，壓迫中國人民。

這類的誤解不只存在於歷史文件內，也存在於現實政治中。中共完全誤解了天主教，把教宗於兩千大禧年所宣佈一百二十個中國殉道聖人的一個單純的宗教事件，聯想成爲有某種政治目的的政治事件。中共如果真心誠意，那麼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地方教會，應該是他們的衷心期望吧！而中國本地聖人的冊封，其實是對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教會，有相當大幫助的。

### （三）教會內的先知先覺者

事實上，教會有足夠的自省能力，中華教會  
在義和團事件後，已經逐漸展開了糾正錯誤的行動。先有雷鳴遠神父取下了教堂中所掛的法國國

旗，代之以滿清的龍旗。民國四年及五年間，他在天津老西開事件中，和中國人站在一起，抵制法國擴張租界的舉動引起了國人普遍的響應與敬重。在英斂之、馬相伯聯合上書教宗，請求在中國興辦大學，以及雷鳴遠、湯作霖爲老西開事件向教廷報告後，教廷瞭解了中國天主教的不正常現象。民國八年，教宗本篤十五世發表了《夫至大通諭》，要求傳教的特質不應帶有帝國主義色彩，要求傳教士注意培植當地的神職人員。民國十一年，在法國仍可能干擾的情形下，教廷毅然派出宗座代表剛恒毅(Celso Costantini)來華，他在民國十三年在上海召開了全國教務會議，確定《夫至大通諭》在中華地方教會內被貫徹執行。

民國十四年，輔仁大學的先修班輔仁社開始招收學生，民國十五年，第一批六位中國籍主教，在羅馬由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祝聖，以後中國籍主教的人數逐漸增加。到了一九四六年二月，青島主教田耕莘由教宗册封爲第一位亞洲及中國樞機，然

後同年宣佈建立中國聖統制。我之所以對這些中國教會史實一一敘述，只是證明普世教會早已努力擺脫西方列強的羈絆，而中華教會也在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中，體質逐漸改變。只是中共似乎現在還不知道或是不願理解這些史實。

#### (四) 教會的反省與道歉

我們也必須誠懇承認當時一些傳教士犯下的錯誤。這些傳教士們不夠尊重中國文化，不夠理解中國習俗，不夠融入中國社會。在西方文化的優越感下，一些傳教士盛氣凌人的態度也是一種錯誤；因爲驕傲，自以爲了解民教之間複雜的恩怨，不夠審慎地涉入訴訟，想要調解糾紛，也是錯誤。而有些傳教士更進一步，以爲憑藉干涉訴訟，可作爲幫助一些人入教的想法，則是更大的錯誤。當時有些教友們，不夠體認自己的國民身份，慣於尋求傳教士及其背後外國政府的協助，也是錯誤。最大的錯誤是掛著教友的身份，想要憑藉著背後外國政府的

撐腰，在地方上呼風喚雨，謀取利益。我想在任何時代，我們都不會把這樣的人，視爲是教會中真正的一份子。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廿四日，在「紀念利瑪竇抵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會議」中曾說：

可惜，歷史告訴我們，教會成員在中國的行爲並非絕無過失。這是人的本性及其行爲有程度的自然苦果，也是與複雜的歷史事件，以及彼此衝突的政治利益糾纏，而難免造成惡劣環境的影響。甚至尚有神學上的紛爭，激怒人心，更爲福傳工作帶來重大的麻煩。在近代歷史的某些階段曾出現一種依仗歐洲列強勢力的「保教權」。雖然從一方面說來，這曾多少有助於教會的傳教活動，但結果究竟限制了教會的行動自由，損害了教會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因此，不期然地阻礙了教會在中國的進展，使教會不能爲中

國人民的好處，一心一意執行其創立者耶穌基督所賦予的使命。爲了這些過去的過錯和缺陷，我深感惋惜。我很遺憾，這些不幸的事情竟在一些人的心裡造成了天主教對中國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視的印象，使他們相信天主教對中國懷有敵意。因爲這一切，我向所有自覺曾被天主教徒的這類行爲所傷害的人們，請求寬恕和原諒。

### （五）客觀研究義和團事件的重要性

或許基於一種對於歐美帝國主義侵略弱勢中國的罪惡感，天主教的歷史學者們不太喜歡深入研究義和團問題以及義和團運動時期的中國天主教歷史。以致我們現在中國天主教史有限的出版品，對此一時期通常只是草草幾筆，匆忙帶過。歷史學家們最喜歡研究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的時期，因爲雖然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國仍有許多困難、痛苦的時刻，但大致而言，傳教活動是被中國政府及

士紳階層容許的，甚至是被尊重及接納的。這個時期歷史的特性是謹慎、明智、溝通、適應、尊重、融合、忍讓及寬仁。我們多麼希望改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所犯的過錯，最好是這一段歷史沒有發生，直接從明末清初跨越時空來到現代。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

面對過去最好的態度就是正視它，我們什麼也不可能逃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曾說：

教會不應該怕懼歷史的真理，雖然內心痛苦，也要為她的兒女們的過失擔負責任。這也包括它對中國人民過去和近來的關係在內。但是歷史真理的追求，必須從容、公正、徹底。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應該由學者們去進行。

諸位瞭解中國情況，請也參與，作出貢獻。我保證，聖座常準備著在這研究工作上與大家合作。（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抵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會議」致詞）

現代中華地方教會與一九零零年代教會的聯

繫，是遠遠勝過十七、十八世紀明末清初時期的。我小時候原屬於獻縣教區，義和團事件留下的記憶仍深深烙印在老一輩教友的心目中。就某方面說，那是一個傷痕，慘痛的回憶，但另一方面殉教的英勇行為，同時也是一種鼓勵，更堅定我們的信仰。因為對這些殉教者的高度肯定，教會經過五十多年時間的調查，嚴格的審核程序。獻縣教區的前身是直隸東南代牧區，一九零零年時是耶穌會傳教區，事件中的五十六位殉教者，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七日獲教宗庇護十二世宣佈為真福。殉道者中有四位法國籍耶穌會士，五十二位中國教友，有男有女，最年長者七十九歲，最年幼者七歲。在此之前，一九四六年，教宗已將方濟各會傳教區二十九位在庚子年間的殉教者宣佈為真福；一九五一年將米蘭外方傳教會在陝西南部殉道的郭西德宣佈為真福。這八十六位真福再加上自天主教傳入中國以來的其他三十四位殉道真福，在二零零零年時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為聖人。

以上的敘述為基礎，我們可以瞭解義和團研究的重要性。我們可以根據以往較少利用的教會檔案，配合已經充份開發的中文史料及外交文獻，寫出我們對義和團事件的客觀描述。藉著這些可受公評的歷史研究，我們才能知道究竟我們犯了甚麼錯誤，對於這些錯誤我們應虛心接受，真正悔改。另一方面，藉著這些更客觀的研究，我們可以澄清誤解，減少偏見。我相信一個十九、二十世紀初葉在歐洲受迫害的教會，不可能到了亞洲就完全變成另一種型態。實際上，將西方列強所犯的罪行都放在教會身上是不公平的。其實教會本身也是這些列強的受害者。

## 結論

我們在這裏舉行的「義和團與中國基督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只是一個開端，至少可以使過去不為人知的史實，部份地呈現出來，而這將是未來整體研究的重要基礎。我們看到大部份相關的修會團

體，都有代表出席或是發表論文，我們未來應該有一個集體的 연구計劃，進行更深入而徹底的研究，這有賴各位會長、院長及學者專家的合作。

感謝香港教區的陳日君主教及聖神研究中心主任湯漢主教，數年來努力促成這個研討會的召開。感謝輔仁大學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陳方中主任盡心努力籌備這個會議。六月十四日聖神研究中心也將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也以義和團和基督宗教為議題再舉辦一天的研討會，將邀請不克來台與會的大陸學者出席。由此也可以看出義和團與基督宗教研究這個議題的敏感性。但是學術性的探討、客觀的研究，使歷史真相實現出來，是消除這些不必要敏感性的最好辦法。最後我祝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各位！

晉宗文代培會開幕誌謝

